

当代学术文化随笔

文字中的历史

程光炜



河南大学出版社

ISBN 7-81091-554-1



9 787810 915540 >

定价：17.50 元

2006

I206.7

143

2006

当代学术文化随笔

文字中的历史

程光炜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中的历史/程光炜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1091-554-1

I. 文… II. 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933 号

责任编辑 李景奇

封面设计 曾晶晶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61 千字

ISBN 7-81091 554-1/1·290

定 价 17.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化与文学观察

- 当代中国文学中主体形象的变迁…………… (3)
- 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中的身份确认 …… (24)
- 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 …… (44)
- 知识与控制 …… (67)
-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 (86)
- 当代中国诗歌 …… (95)
- 多种声音的时代…………… (117)

读书内外

- 诗人·史家·政治家…………… (157)
- 在大地山河之间…………… (166)
-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拓者…………… (174)
- 从书斋到社会…………… (181)
- 李长之和他的《鲁迅批判》…………… (189)

说“文”还从之“道”来·····	(193)
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198)
平静的心情·····	(202)
迟到的祭文·····	(206)
一个人的车站·····	(213)
摄影文学:另一种叙事的形式·····	(217)

文 坛 前 沿

小说的尺度·····	(223)
跨世纪的文学想象·····	(227)
叙事的可能·····	(230)
博尔赫斯之谜·····	(233)
编辑部的“黑色幽默”·····	(236)
身份的危机·····	(239)
南方场景和北方叙事·····	(241)
在层峦叠嶂之间·····	(243)
都市女性的虚幻家园·····	(247)
阻隔与交流的时代·····	(251)
2002年的年轻诗坛·····	(255)
诗歌:校园文化的一个缩影·····	(258)
七月诗派后期的代表诗人——牛汉·····	(262)
窗了里面的风景·····	(269)
靠什么来打磨思想·····	(272)
那无形的存在·····	(275)

文化与文学观察

当代中国文学中主体 形象的变迁

回溯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主体形象在确立多年之后，开始出现了弱化、调整与变动的现象。1949年，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因此，关键问题是要确立“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而将塑造“工农兵形象”尽快地纳入议事日程，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①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个说法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的品级，而将工农兵确立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主体形象，并进行大规模持续的生产，一直到1976年为止。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

近 30 年后,对主体形象的认识和生产方式,为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的小说《伤痕》所打破。这种剧变,正好可以印证佛克马、蚁布思的一个判断:即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会改变那些监督和认可经典的机构,因此而改变了经典的内部构成。“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比如像 18 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①20 世纪 90 年代后,任何人都会注意到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时的多元化选择,工农兵形象被进一步边缘化,白领、老板、中产阶级开始涌入人物形象的主要空间,当然,下一步的走向是什么,一时间将很难判明。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愿意从当代中国文学主体形象的“变迁”入手,讨论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在讨论中,我会引人佛克马等人关于“历史意识”将会引发“新的问题和答案”,以及引出“新的经典”的概念。但是,我仍将会注意,主体形象的变迁,对当代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

一、一篇小说和一个话题

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难有一篇文学作品能够像

^① (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 4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0年代文学那样，标明文学的“转折”、“创新”和“探索”了。文学“焦点”或说“热点”的消失，说明文学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至少已经不在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视野之中。但是，仍有一篇小说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了某种波澜，这就是卫慧的《上海宝贝》。

有趣的是，该小说招致批评的居然不是对敏感社会“问题”的冒犯，而是在正人君子那里难以出口的字眼：“色情”。在文中讨论这篇作品是无多大意义的，我更关心的是由它引发的一个话题：什么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心？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文学的主体形象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篇小说说明了“欲望”在当今社会支配人们生活的程度，换句话说，欲望所产生的幻觉导致了人的深度的迷失。由此人们会联想，什么是历史？它的真实性又在哪里？我们又怎样判断历史呢？它的方法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精神生活的“空心化”，并不只是《上海宝贝》中的那一代人才拥有的生命状况，也照耀出当前许多人的内心世界。对90年代文学而言，它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学叙事上的“非历史化”。在这里，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大批“重量级”的小说为例：《废都》、《长恨歌》、《白鹿原》、《故乡而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口红》、《来来往往》、《敌人》、《赤朱》、《抚摸》、《软弱》、《大浴女》、《羊的门》、《国画》、《千万别把我当人》、《宿命》、《浮世缘》、《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丰乳肥臀》、《走进夜晚》、《尘埃落定》、《我

的帝王生涯》等等。在上述小说中，“历史”只是作为“问题”和“材料”而存在的，而没有了有血有肉的“过程”；它的时间观也不是直线向前和连续性的，而是断裂的、颠倒的、可以随意拼装的，因此，它的叙述是那种不可信的；在创作中，作家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就能瓦解历史的“全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曾经称之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的真实性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人们会问：在这一过程中，有什么可以构成“真实”的“故事”？

进一步说，作为当代文学形象主体的工农兵的形象，究竟是被历史“构造”出来的，还是历史本身呢？海登·怀特如下的论述，对我们继续的思考也许是重要的：“‘历史’不仅是我们可以研究和进行研究的一个客体，而且，甚至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事实上，历史话语是据结构上具有意义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是一种特殊的书写，在历史修撰的理论和实践上允许我们考虑与文学理论的相关性。”他接着又说：“历史话语的这一特征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从未真正存在过，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过去实体的比较准确的信息，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应用包括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科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的不同方法把这个信息改造成知识。相反，它旨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过去的信息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信息，以

这种信息为基础的知识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知识。”^①

显然，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看来，争论历史真实性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结果的。文学“焦点”的丧失，生活“中心”的不复存在，深层次上说明人们终于感觉到，历史说到底即意味着它是“一种特殊的书写”，或者说，是“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那种曾经被深信不疑的“历史”，实际是“构造”出来的，它的主体形象，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书写”而已。从书名看，陈忠实的《白鹿原》很像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农民革命传奇”，其实，它超越了阶级对垒的历史结论，而把所有人物置于“家族恩怨”、“两相仇杀”这一新的历史平台。翻身农民的形象，受到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大家族势力的压抑，前者的革命冲动，显然也在对白嘉轩的历史叙述中被消解。小说告诉读者，白嘉轩一生干了如下几件大事：前仆后继地换了七房女人，以续香火；为中兴家业机关算尽，终得人财两旺；办学堂，兴仁义，立乡约，正民风；在苛政之下，率民抗税交农；大旱年，为乞雨自残其身；最为动人之处，乃是当淫鬼大闹白鹿原时，白嘉轩挺身而出，冒族人之大不韪，毅然修塔镇邪……没有人不相信，《白鹿原》实际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一次引人注目的改写，它以自己的方式，重新

^①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构造了民国以来 50 年间中国农民的“历史”。

正是在这里,《上海宝贝》显示了它非同寻常的含义。霓虹灯,繁华街景,咖啡馆,淮海路,这些典型的大都市的意象,不仅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中心场景”的置换,而且意味着,它“书写”对象、范围和所指的变化。换句话说,历史不单暴露出它“书写”的特质,由此也开始了它书写的时代。

二、“下岗”:对主体形象的一种颠覆

上世纪 90 年代末,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故事》发表后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度热播。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北京市的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家庭,因为“下岗”而陷入困境。

一定程度上,张大民“下岗”的故事,标志工农兵神话的终结。在纪念碑、大型宣传广告牌和各种电影纪录片的片头上,光彩夺目的工农兵形象一下子变得暗淡。这些曾被赞扬为“国家主人翁”的英雄人物,一时间重新回到了小巷陋室,恢复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对这一沧桑的历史巨变,卢卡奇似乎早就有预感,他指出,“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

除”，为此他警告说，“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①

社会劳动“合理化”的历史进程，将张大民像千百万个产业工人一样，还原为“普通人”；现实这只巨手，把他由“工农兵”群体中的一员，变成了传统社会里的“长子”。失业，中断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导致了家庭正常生活的严重倾斜。他被邻居用砖头砸破了头，无力阻止大妹感情的被欺骗，他乐观、幽默的天性，与其江河日下的生活景况，形成了令人悲哀的鲜明对照。为使妻子相信自己还在“上班”，他白天在公园里转悠，晚上到车站混时间，差一点儿被警察当成了盲流。在张大民身上，读者不难意识到，他已从社会中心滑向了边缘。

大民的大妹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她个性倔强，性情直率，生活的贫困，使她一次次失去恋爱、嫁人的机会。她先爱上一个司机，饭盒里的好菜舍不得吃，每天都匆匆忙忙给他送去。但是，当她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时刻，透过驾驶室窗户看到男朋友的背叛时，这场单恋的残酷游戏终于结束。最后，她“下嫁”给一个农村个体户，给自己艰辛的爱情追求画上一个句号。

更需要研究的，还有大民小弟从这个“工人家庭”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8—151页，商务印书馆，1996。

中的“出走”。在这个狭窄、沉闷的家庭中，他首先感到的是“空间”的压抑。他已长到成人年龄，但被迫与两位姐姐同住在一间房屋中，而且睡在双人床的上铺。母亲生病，大哥、二哥下岗，两位姐姐爱情和婚姻的道路坎坷不平，这一连串的变故，都使他屈辱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的“阶层”。为此，他发奋准备高考，卧薪尝胆地要拼打出另一个人生的前景，他人生的誓言是：“我要离开这个家庭！”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就是“家”的背叛者。《伤逝》中的子君，《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家》中的高觉新，《寒夜》中的曾树生，都是这一背叛者“家族”中的成员。五六十年代，社会“出身”成为评价它的成员的重要标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出身”工农兵家庭曾是一个人非常耀眼的生命符号。历史，真是有点儿残酷。历史总是在人类无法把握的“轮换”中，让人意识到它的沉重和无奈。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民小弟要走出的不是地主家庭，而是工人家庭。新社会评价人的标准，在他这里不仅遭到了嘲弄，甚至遭到了遗弃。或许，正如佛克马们所要表达的那样，文学经典的功能之一即是为了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它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对这个新的背叛者来说，他如果放弃“出走”，那他就会是另一个张大民。他将会重蹈哥哥、姐姐们的人生“覆辙”，在这个狭窄、贫困的家庭中生儿育女，每天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

苦斗，而打拼。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出走，凸现出值得探讨的文学社会学的课题。或许，他将是人们需要研究的下一个文学“经典”。

但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上述人物的文学史意义也许还不只这些。进一步说，张大民们作为五六十年代文学主体形象的被确立，实际是解放后社会资源被重新“分配”的结果。解放后，工农兵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随着国家资源、个人财产的重新整合，工人一跃而为“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的主导性的力量。个人收入的增加，不单意味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更是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对一个人的社会评价系统所依据的并不完全是经济指标^①，在某种程度上，他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形象地位却证明着在公众心目中的分量。也就是说，工农兵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远远大于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资源。

张大民形象在文学中的出现，包含着对上述既成事实的某种颠覆。对当代中国文学，它最突出的意义也许在于，作家的创作不再按照政策需要、宣传目标而进行了，而是回到了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商业形式的“普遍性”和社会劳动的日益“合理化”，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尽管作家对张人民等社会

^① 例如，除了“文革”时期外，知识分子的实际工资一直高于工人，但其社会地位却一直低于后者。